

# “否定词+说”类话语标记的形成及演变

王慧敏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00)

**摘要:** 本文从历时的角度, 对“否定词+说”类话语标记的形成及演变做出分析, 重点围绕“别说”、“休说”“莫说”、“不说”几个词的历时发展, 探求它们如何由“副词+动词”词组衍生出话语标记的用法, 在语篇中发挥作用。“别说”、“休说”“莫说”、“不说”几个词在语义上存在共同点, 即都含有[+否定]义素, 但是它们演变出话语标记的路径却不尽相同, 对他们演变的路径进行历时考察, 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关键词:** 别说 休说、莫说 不说 话语标记 信息结构

**中图分类号:** H13

**文献标识码:** A

## 1. 问题的提出

周莉(2012)先后发表《现代汉语“别说”的语义、功能研究》、《“别说”类语用标记来源探讨》两篇文章, 将“别说”类语用标记细化, 探讨其来源, 并尝试解决语义和结构一功能之间的接口问题, 值得肯定, 但其对“别说”类语用标记的考察还不够全面, 还有值得拓展研究的领域。

董秀芳(2007)也对“别说”话语标记的形成做过研究, 认为其是词汇化作用的结果, 并顺势发现词汇化与语法化密切相关, 二者有一致的演变结果, 可以在同一语言形式上相继进行。李思旭(2012)同董(2007)一样, 从词汇化和语法化的角度, 将“别说”与“完了”、“就是”三个话语标记放在一起讨论, 探讨了话语标记的来源及其形成动因, 他们二人的说法有一定的说服力, 但除了从词汇化和语法化的角度研究话语标记的形成, 我们还可以将“别说”类话语标记看做一个个子图式, 从构式的角度进行研究。

李宗江(2014)对李思旭(2012)的观点提出质疑, 通过事实的分析证明“别说”(也包括“就是”)的话语标记用法并非是由连词演变而来, 而是由动词短语“不要这样说”的意义直接演变而来, 这一观点可供参考, 但是李就事论事, 只考虑了“别说”的话语标记的来源问题,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此外, 孙洪威(2013)从“别说”的语法化和属性分类入手, 分析其反预期功能; 喻薇(2018)对BBC语料中“别说”出现的情况进行统计, 对话语标记“别说”的句法分布问题进行研究。两位学者的研究角度都有一定的创新, 值得借鉴。

马姗姗(2015)把“不说”作为研究重点, 将其放在语篇中分析, 通过结构和功能的分析, 发现“不说”语义内容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鉴于学界对“不说”的话语标记功能研究较少, 她的研究有一定的突破性。

李小玲(2008)对现代汉语中的话语标记“X说”的词汇化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在对分析多义形式“别说”的意义、功能的基础上, 指出“别说”的话语标记用。李丽娟(2015)也谈到了动词“说”为核心构成的话语标记, 她选取了“我敢说”、“要说”“说起来”、“别说”三类进行考察。二人的考察对象更加系统全面, 对“说”类话语标记的研究更加宏观, 但还是延续了词汇化和语法化的研究方法。

综合以上各家看法, 研究者们对“说”类话语标记的研究, 大多建立在现代汉语中“说”

出现的语料上,探求其语义、语用功能,从词汇化和语法化的角度,推测其大致演变脉络。本文拟从历时的角度考察“否定词+说”类话语标记的形成和演变,结合信息结构及构式的相关理论,从形式和意义两个方面,探求“否定词+说”类话语标记形成及演变的过程。

## 2. 唐以前“否定词+说”类结构的出现

唐以前的“否定词+说”类结构,尚未出现充当话语标记的用法。结构上,否定词做状语修饰动词“说”,“说”既是结构核心又是语义核心,整体构成以“说”为核心的动词短语。

### 2.1 别说

唐以前的“别说”大致出现在下面两种语境中:a.形式:adj+n,语义:别的说法;b.形式:adv+v,语义:分别说、从别的观点说。如下例:

(1) 儒不能都晓古今,欲各别说其经,经事义类,乃以不知为贵也。(东汉《论衡》)

(2) 若离本性,别说三身,即名有身无智。(南宋《五灯会元》)

例(1)中,“别说”的语义为分别阐述,例(2)中,“别说”的语义为别的说法,此两例中的“别”和“说”语义独立,“别”和“说”只是在语境中临时组合,构成短语。

上述这两种用法都与后来话语标记“别说”的形成无关,因此,我们认为话语标记“别说”的形成另有他径。

### 2.2 不说

同样出现在唐以前的“否定词+说”类结构,还有“不说”。用义素分析法分析“不说”,可得其重要的两个义素:[+否定义]、[+言说]。状中短语“不说”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且用例稀少。如下例:

(3) 礼乐法而不可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逮。(战国《荀子》)

例(3)中,“不说”的[+否定义]、[+言说]两个义素都很明显,“说”是谈论的意思,其动词义都很明显。结构上,“不说”后不接成分,在句中充当前面中心语的补语。

状中结构“不说”的用法,一直延续到唐朝。两汉至唐朝,“不说”大都以状中短语的形式出现在各类句子中。如下例:

(4) 不说是非难。会善知识难。见性学道难。随化度人难。(东汉《佛说四十二章经》)

(5) 苟有时日,诚有祸祟,圣人何惜不言,何畏不说?(东汉王充《论衡》)

(6) 欲显其说,则迷其无说。然欲不说不示,复难以通其义,故玄道离微,至理难显。(六朝《佛语录·宝藏论》)

上述各例中的“不说”都是状中短语结构,在句中位置灵活,可出现在句首、句中、句末。各句中“说”的语义不尽相同,但都带有明显的动作义。

综上所述,唐以前的“否定词+说”结构还是比较纯粹的状中短语,“说”动作义明显,是整个短语的语义核心。

## 3. 唐宋“否定词+说”类结构话语标记的出现

唐宋时期,一些“否定词+说”类结构出现了话语标记的用法,但用例不多,使用还不成熟。

### 3.1 五代“不说”

五代时期，“不说”的状中结构用法占主流，同时也出现了话语标记的用法，如下例：

(7) 不说当初佛在日，如今闻说也（归）依。（五代《敦煌变文集新书》）

例（7）中，“不说”位于第一小句的句首，其后所接成分是对“当初”情境的描写，与后一小句中对“如今”情境的描写形成对比，从语用上来看，“不说”在这里起对比型话语标记的作用。语义上，“不说”的两个义素[+否定义]、[+言说]都有所削弱，尤其是[+言说]义素，“不说”不再强调言语行为这一具体动作，而是偏向于提示下文将会出现对比，由突出其语义功能转向突出其语用功能。

这一时期“不说”充当对比型话语标记语的用例不多，发展不够成熟。

### 3.2 南宋“休说”

“休说”一词最早出现于南宋时期，副词“休”与动词“说”组合，整体表示不要说、不必说，义素分析为[+否定义]、[+言说]。南宋时期的“休说”，按照句法和信息功能，大致可分为谓语核心和话语标记两种类型。如下例：

(8) 世人休说路行难，鸟道羊肠咫尺间。（南宋《佛语录·五灯会元》）

例（8）中的“休说”是动词短语，充当谓语核心，后接独立小句“路行难”。“休说”表示不要说，含[+否定义]、[+言说]两个典型义素。“说”的动词义很突出，表言说、言谈。“休说”在句中充当谓语核心，表示宾语部分的内容是不用、不必言说的。

南宋时期，“休说”出现了充当对比型标记语的用法。这种“休说”常出现在词中，“休说”后常接两种差别较大的情境对比，作者通过这种对比来表达其思想感情。如下例：

(9) 休说往事皆非，而今云是，且把清尊酌。（南宋《辛弃疾词》）

(10)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南宋《辛弃疾词》）

例（9）、（10），从结构上来看，“休说”后接的都是独立小句，整体表达偏向对往日的追思，紧接一小句是对眼前情境的描述，古今对比，时过境迁，表达词人心中的苍凉之感，例（9）与（10）稍有不同，“休说”小句后紧接的一小句的句首，有一连词“而”，可见其后一小句与前一小句的联系在结构上更加密切。从语义上来看，“休说”动词[+言说]的义素基本消失，“休说”一词开始偏向表达说话人的心理活动，“说”理解为“提及、论及”更准确。通过上例可见，由位于句首的“休说”引导的小句，常常与其后紧跟的小句形成情境对比，且“说”的动词义义素逐渐消失，因此可以这里可以将“休说”看作对比型标记语，其所在的句子结构如下所示：

[（休说）<sub>对比型标记语</sub>……]小句A，[……]小句B。（小句A和小句B形成对比，且“休说”是小句A的一部分，引领小句A。）

不过，南宋时期的对比型标记语“休说”常常出现在词中，受修辞的影响较大，因此“休说”出现的句式还不够灵活，话语标记的使用频率整体较低。

## 4. 元明“否定词+说”类话语标记的成熟

元明时期，“否定词+说”类结构中，“说”的动词义大大削弱，整体充当话语标记的用法大量出现并走向成熟。

### 4.1 别说

元杂剧中出现了“别说”作为话语标记的用法，如下例：

(11) 若是似往年好收时，别说你两三个人，就是十数个客人，我也能都给茶饭吃。（元《老乞大新释》）

(12) 这样甚好，别说黄金贵，平安直钱多。(元《老乞大新释》)

上述各例中，“别说”的“说”动词义逐渐消失，在信息结构中，对比强调后面事实信息的作用凸显，具有了话语标记的特征。如例(11)中的“别说”，标记后面接的内容是客观事实，说话人这里强调一遍事实——“你两三个人”，紧接着又做出夸张假设“就是十数个客人”，最后引出最后自己的评价——“我也能给茶饭吃”，事实与假设对照，更加凸显说话人的态度。例(12)与例(11)相比，“别说”后也跟的是客观事实，但是其后没有做进一步的假设，而是直接表达了自己的主观评价——“平安直钱多”，“别说”同样充当对比强调标记的作用。

到了明代，“别说”又出现了新的用法。一种是“别说”位于句子的前半部分，一种则是“别说”位于句子的后半部分。

(13) 前边若堵塞严严的，后头再追逼的紧，别说是人，就是狗也生出极法来了。(明《醒世姻缘传(上)》)

例(13)中，“别说”紧跟省略主语的动宾短语。“别说”小句后是说话人针对放大事实作出的夸张假设，最后是说话人的主观评价，“别说”起对比强调标记的作用，从句子结构上看，位于句子前半部分，而整句话的核心信息，即说话人想表达的态度，出现在句子末尾。“别说”与其后的成分联系紧密，语音上不做停顿。

(14) 晁夫人道：“天老爷可怜见养活大了，就讨吃也罢，别说还有二十顷地，够他吃的哩。”(明《醒世姻缘传(上)》)

例(14)中，整个“别说”构成的小句，位于句子的后半部分，话语标记“别说”，对比强调其后的事实。从上下文来看，小句是对前文所述信息的补充，整句话的核心信息，即事实或说话人的评价，都位于“别说”小句前。

综上，相较(13)来说，(14)的话语标记功能更强，独立性更高，真值义更低，在信息结构中的作用更加凸显。结合明代提示标记“别说”出现在句子前半部分和句子后半部分两种情况，我们发现，提示标记“别说”引导的小句，在句子结构上，可以在核心信息之前，也可出现在核心信息之后，其距离核心信息较远，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尤其是提示标记“别说”位于句子后半部分，其独立性程度更高，话语标记特点更加显著。

#### 4.2 休说

元代“休说”在句子中可出现在句中，也可出现在句首，句中“休说”充当该小句的谓语核心，但受前面小句的影响，其在句中的位置没有为其成为话语标记创造条件，而位于句首的“休说”，引领一个独立小句，这个独立小句是对具体情况的描述。“休说”小句后常接让步关系复句，复句的前半句与“休说”小句形成对比。“休说”小句与其后所接的复句相对独立。如下例：

(15) 任一郎看了，道：“观察，不打紧。休说是一两年做的，就是四五年前做的，坐簿还在家中，却着人同去取来对看，便有分晓。”(元《元代话本选集》)

(16) 休说三官十六七岁，北京是花柳之所，就是久惯江湖，也迷了心。(元《元代话本选集》)

上例中，“休说”都位于句首，引领一个小句，而后再接让步关系复句。例(15)中的“休说”后接的小句主语省略，其后的复句是由“就是……却……”相连的让步关系复句，例(16)也大同小异。“休说”小句与其后复句的前一小句也有明显的对比，如例(15)中，“休说是一两年做的”就与其后“就是四五年前做的”有明显的对比，但是相较而言，复句两个小分句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因此“休说”小句就与让步关系复句分割开来，获得了更高的独立性。语义上，“休说”的[+否定义]、[+言说]两个义素也不再被强调。“休说”位于句首，在语用上，对整个篇章起到了篇章起始作用，其篇章起始标记语的功能开始显现。

这一时期，含“休说”句的语句结构为：“休说”小句+让步关系复句。“休说”由对

比型话语标记, 演变为语篇起始标记语。整个句子看来, 复句部分才是核心语义, “休说”小句则从核心语义中独立出来, 作为独立小句位于句子前段。语篇起始标记“休说”在句中的结构如下图所示:

[ (休说)<sub>语篇起始标记</sub>…… ]<sub>小句A</sub>, [让步复句]<sub>小句B</sub>。(小句B是语义核心, “休说”是整个小句的语篇起始标记, 位于小句A的前段)

元代的语篇起始标记“休说”大多出现在元杂剧中, 相较词来说, 元杂剧的语言形式更加灵活, “休说”受语境的限制减少, 使用更加灵活, 其话语标记的语用功能得到发展。

明代, 语篇起始标记“休说”进一步发展。

(17) 休说邬文化血肉身躯, 就是满山中披毛带角的皆逢其劫。(明《封神演义(下)》)

(18) 休说恁地好买卖, 便不开店时, 也养叔叔在家。(明《水浒全传(中)》)

从上例中可以看出, 这一时期的语篇起始标记“休说”基本沿用了元代时的功能, 并且已经广泛应用于小说写作中, 使用起来更加顺畅, 启明了后续语篇的发展, 整个句子的语义核心仍聚集在“休说”小句后紧跟的让步关系复句中。

#### 4.3 莫说

“莫说”一词最早出现在明代, 明及以后“莫说”的话语标记用法, 基本与明及以后“休说”的用法相当, 两者可以相互替换。如下例:

(19) 言未讫, 黄盖进曰: “莫说三个月, 便支三十个月粮草, 也不济事!” (明《三国演义(中)》)

(20) 莫说渡江以来, 都城失火从未有如此浩劫, 就是历古以来, 也未之前闻。(民国《宋代十八朝宫廷艳史》)

上述各例中的“莫说”, 都可被具有同样语篇起始标记功能的“休说”替代, 可见明及明以后的话语标记“莫说”, 不管是语义上, 还是语用上, 其意义和功能都与明及明以后的话语标记“休说”相当, “莫说”小句与其后的让步关系复句逐渐脱离, 不涉及句子的语义核心, 起着语篇起始标记作用。

#### 4.4 不说

元代, “不说”出现了话题转换标记的用法:

(21) 不说安妃娘娘龙冠六宫。单说内中有一位夫人, 姓韩, 名玉翘, 妙选入宫, 年方及笄。玉佩敲磐, 罗裙曳云。体欺皓雪之容光, 脸夺芙蓉之娇艳。(元《元代话本选集》)

例(21)中的“不说”位于句首, 单独引导一个小句, “不说”小句后又出现了“单说”引导的句子。“不说”的两个义素[+否定义]、[+言说]都有所削弱, 动词义不再凸显。从内容上来看, “不说”小句描述的是事件A(这里指安妃娘娘), 而“单说”小句描述的是事件B(这里指韩玉翘), “不说”出现在事件A的句首, 预示着下文将不再讨论事件A, 即将转而讨论事件B, 因此从语用上来看, “不说”在语境中起话题转换标记的作用。

明代, “不说”的话题转换标记用法走向成熟, 出现了大量的“不说……。且说/却说/再说……。”格式。如下例:

(22) 不说孔融起兵。且说玄德离北海来见公孙瓒, 具说欲救徐州之事。(明《三国演义(上)》)

(23) 不说魏兵起程。却说东吴细作探知此事, 报入吴国。(明《三国演义(下)》)

(24) 不说胡阿虎暗生奸计, 再说王生自女儿死后, 不觉一月有余, 亲眷朋友每每备了酒肴与他释泪, 他也渐不在心上了。(明《今古奇观(下)》)

上例中, “不说”引导的小句, 与其后“且说、却说、再说”引导的小句, 分别描述不同的事件, 相对独立。“不说”位于整个语篇的句首, 暗示“不说”小句引导的事件接下来不再赘述, 提醒读者即将进入下一事件的叙述中。这种“不说”常出现在明代小说文本中,

用于各故事之间的转场，具有提示话题转换的作用。

综上所述，元明时期，“否定词+说”类结构充当话语标记的用法逐渐变多，走向成熟。话语标记种类逐渐多元化，每种话语标记都相当于“否定词+说”类结构中的一个子图式，随着子图式的不断扩大，“否定词+说”类结构的能产性、组合性、图式性也逐渐增强，整个图式愈发完整成熟。

## 5. 清以后“否定词+说”类结构的稳定

清代及以后，“否定词+说”类各种话语标记的用法渐趋稳定，发展到现代汉语，使用更加灵活，语用功能更加明显。

### 5.1 别说

清代，“别说”对比强调标记保留，并出现了反预期标记用法。反预期标记“别说”后接的也是事实，但是与明代不同的是，明代“别说”后接的事实，说话人与听话人双方都知道，而清代“别说”出现充当反预期标记的用法，“别说”后接的事实，只有说话人知道，听话人并不知道。如下例：

(25) 湘云道：“三姐姐，你也别说。你可记得‘十里荷花，三秋桂子’？在南边，正是晚桂开的时候了。你只没有见过罢了，等你明日到南边去的时候，你自然也就知道了。”（清《红楼梦》）

(26) 徐良说：“老兄弟，你别说，我师父可就是老道。”（清《小五义》）

例(25)中，“你也别说”独立出来，后面的信息是说话人知道，而听话人不知道的，例(26)同样，“你别说”独立小句，标记后面的信息是出乎听话人预期的。

反预期标记“别说”相对对比强调标记“别说”来说，独立性更高，话语标记的特征更加明显。上述两例中，“别说”还能与第二人称自由组合，构成独立小句，整个小句都起标记的作用，且“别说”后面的成分语义上与其关系不再紧密，这也为“别说”小句韵律上的独立创造了条件。

民国时期，“别说”反预期标记成熟，基本与现代汉语中“别说”的用法一致。

(27) 别说，他这句话真把这些兵卒吓住了。（民国《武宗逸史》）

例(27)中，“别说”单独位于句首。整体来看，“别说”在句子中的位置前移，出现在句首的用法普遍，在承接原有信息的基础上，从“别说”处转折，“别说”后的信息是听话人意想不到的新信息，也就是语篇的核心信息，而接下来的信息都会围绕新信息展开。

### 5.2 休说

明以后，“休说”的话语标记功能与明代基本一致，保留了其语篇起始标记的用法，如下例：

(28) 休说二十年，即使五六十年，七八十年，小儿修持不力，学道无成，即是大不孝的逆子，纵令归来，誓不相见。（清《八仙得道（上）》）

(29) 休说区区一个警务处长，便做一个督军巡阅，也并非分外。（民国《民国演义》）

上例可见，明以后，“休说”作为话语标记，其语篇起始作用被延续下来。虽然从南宋开始，“休说”就出现了话语标记的功能，但是动词短语“休说”的用法也被保留了下来，并沿用至今。

### 5.3 不说

“不说”的话题转化标记作用，在清代得以延续，但与明代相比又有不同，如下例：

(30) 不说马家村众人猜疑不定，且说一枝梅、徐鸣皋见后面追兵已去，天色渐明，遂

缓缓而行。（清《七剑十三侠（上）》）

例（30）中的“不说”小句描述的事件A，与其后“再说、且说、只说”引领的事件B是同一事件，两个小句描述的是同一事件下的众生相。因此，从信息结构上来看，“不说”小句与其后的“再说、且说、只说”小句联系较紧密，相较于明代“不说”小句出现的用例，清代“不说”小句的独立性不高，话题转换标记作用不太明显。“不说”在历时演变中，其状中结构的用法始终占据主要地位，而其话语标记的功能虽有所表现，但始终地位较低，使用频率不高，发展到后期甚至出现弱化的现象。

综上所述，清代以后，“否定词+说”类话语标记的用法渐趋稳定，但是它们充当谓语核心的用法依旧有所保留。

## 6. 动因和机制

“否定词+说”话语标记的形成与演变，与去范畴化与重新分析机制有关。

“别说”由动词短语发展为话语标记的过程中，作为动词的语义和功能逐渐脱落，失去了作为动词的典型范畴特征，由表具体的言说义发展为表抽象的程序义或功能义，逐步获得话语标记的典型范畴特征，如位置灵活，具有多种语用功能，存在本身不影响句子的真值意义或是命题意义，对语境依赖程度高，能直接表述说话者本身的情感功能，同时具备篇章语用功能等。刘正光（2006）认为这一演变过程的重要推动因素即是去范畴化。如“不说”，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时期，但在唐以前，其充当谓语核心的用法始终占据主流，元明时期话语标记“不说”的成熟，主要特征就是“说”的动词义逐渐消失，结构不再强调否定“说”这一行为动作，“不说”整体表达说话人心理上不再强调某一事件。

Langacker（1977）定义重新分析——一个或一类表达的结构变化，这种变化不包括它任何直接或固有的表层显现的修饰关系，即没有改变表层表达形式的结构变化。从这个角度看，重新分析包括构成成分、层次结构、范畴标注、语法关系和黏着性（边界类型）的变化，这些特点彼此相互联系，很多情况下，一个重新分析的例子会显示若干个特点。在话语标记“休说”的形成过程中就发生了重新分析，元代的“休说”出现语篇起始标记用法——〔（休说）<sub>语篇起始标记</sub>……〕<sub>小句A</sub>，〔让步复句〕<sub>小句B</sub>。（小句B是语义核心，“休说”是整个小句的语篇起始标记，位于小句A的前段）这一时期的“休说”小句结构独立，与其后的让步复句联系不大，“休说”的语篇起始标记作用凸显，重新分析发挥作用。

## 7. 小结

本文从历时的角度，考察了“否定词+说”类话语标记的形成及演变过程。

唐代以前，“否定词+说”类结构主要为单纯的状中结构，“说”的动作义强烈，充当结构的核心成分，如“别说”、“休说”、“不说”，这些结构中的“别”、“休”、“不”都是对动词“说”的否定，这种用法始终为“否定词+说”类结构的重要用法。到了唐宋时期，“不说”、“休说”都出现了话语标记的用法，但用例较少，并不常见，直到元明时期，受去范畴化和重新分析等因素的影响，各类“否定词+说”类结构的话语标记用法蓬勃发展，并逐渐成熟，如元明“别说”充当对比强调标记、“休说”充当语篇起始标记、“不说”充当话题转换标记……有些用法到了清代及现代汉语中依旧被保留下来。在“否定词+说”类话语标记形成过程中，其图式不断扩大，能产性、组合性、图式性都逐步增强。

## 参考文献

- [1] 董秀芳 词汇化与话语标记的形成[J], 世界汉语教学, 2007 (01) .
- [2] 李思旭 从词汇化、语法化看话语标记的形成——兼谈话语标记的来源问题[J], 世界汉语教学, 2012, 26 (03) .
- [3] 李丽娟 动词“看、想、说、知道”为核心构成的话语标记研究[D],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8.
- [4] 孙洪威 反预期标记“别说”[J], 社科纵横(新理论版), 2013, 28 (01) .
- [5] 李小玲 话语标记“X说”的词汇化研究[D], 汕头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 [6] 杨望龙 话语标记产生机制研究[D],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6.
- [7] 周莉 现代汉语“别说”的语义功能研究[D],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2.
- [8] 周莉 “别说”类语用标记来源探讨[J], 汉语学报, 2013 (02) .
- [9] 喻薇 言说动词“说”和“说”类话语标记的语法化[D],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9.
- [10] 李宗江 也说话语标记“别说”的来源——再谈话语标记来源的研究[J], 世界汉语教学, 2014, 28 (02) .

##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Discourse Markers of "Negative Word + 说"

Wang huimin

(Schoo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410000)

**Abstract:** From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negative word + say" type of discourse markers, focusing on the diachronic development of "bie shuo", "xiu shuo", "mo shuo" and "bu shuo", and explores how they derive the usage of discourse markers from the phrase "adverb + verb" and play a role in the discourse. "bie shuo", "xiu shuo", "mo shuo" and "bu shuo" have some semantically common ground, that is, they all contain [+ negative] sememe, but they have different paths to develop discourse markers, and it is of certain research value to make a diachronic investigation of their evolution paths.

**Keywords:** bie shuo ; xiu shuo、mo shuo; bu shuo; discourse marker; information structure

**作者简介(可选):** 王慧敏(1997—), 安徽合肥人, 湖南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历时语言学。